

方德萬(Hans van de Ven)著,何啟仁譯,張志雲、沈高陽譯校,  
《戰火中國 1937-1952:流轉的勝利與悲劇,近代新中國的  
內爆與崛起》

臺北:聯經出版公司,2020。480頁。

### 呂 迅<sup>\*</sup>

劍橋大學方德萬(Hans van de Ven)教授的《戰火中國》(*China at War: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, 1937-1952*)一書,早先於2017、2018年分別由英國Profile Books公司及美國哈佛大學推出面世,中文版新近則由聯經出版公司譯介出版。全書以中國抗戰至韓戰期間的大國外交為背景,以中日、中美之間的重要戰役為切入點,試圖描述跨越十五年而動盪的中國社會。作者更在作品中融入了普通民眾的生活經歷,豐富了歷史的不同面向,使得原本政治軍事史為主的敘述更加人性化。

在國際主流歷史敘述中,有關中國抗戰以及韓戰的研究,處於長期邊緣化或被選擇性遺忘的地位,與類似的戰爭題材相比,一直較為薄弱。以致方德萬氏在牛津的同事米德(Rana Mitter)要寫一本《被遺忘的盟友》來重拾中國抗戰的歷史地位。<sup>1</sup>而韓戰在美國就直接被稱為「被遺忘的戰爭」。<sup>2</sup>毫無疑問,「戰火中國」是個傳統的政治軍事史話題,而傳統民國政治軍事史的主流論述產生於抗戰結束前後至「冷戰」方殷之時。早期代表作包括外交史《中國之糾

---

\*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<sup>1</sup> Rana Mitter, *Forgotten Ally: China's World War II, 1937-1945* (Boston: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, 2013).

<sup>2</sup> David Cheng Chang, *The Hijacked War: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20), p. 10.

葛》和軍事史「中印緬戰區」三部曲，其作者都具美國官方背景，有官修史書性質。<sup>3</sup>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以之為基礎，參考部分美國外交檔案，在 1963 年出版了外交史著作《美國在中國的失敗》，奠定了此後民國政治軍事史的討論框架。鄒讜不單就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目標和實際之間的巨大落差提出批評，更對國民政府罔顧政治軍事分裂現狀持尖銳的批判態度，指出蔣介石集權、一黨專政以及國家軍隊私人化是國民政府軍事不振、政治乏力的根本病因。<sup>4</sup>鄒讜對國民政府的批評得到了哈佛費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）教授強有力的支持。<sup>5</sup>十數年後，費正清的學生易勞逸（Lloyd E. Eastman）教授也陸續出版了影響深遠的《流產的革命》和《毀滅的種子》姊妹篇，可以看作將鄒讜所謂國民黨大陸時期的「眼高」（program）和「手低」（practice）分為兩部來論述。<sup>6</sup>易勞逸的作品確定了國際史學界關於「戰火中國」的論述基調。後來，費正清的另一位高足、明初軍事史專家戴德（Edward L. Dreyer）教授嘗試從袁世凱的新軍改革開始，論述二十世紀上半期發生的主要戰爭與高層政治。<sup>7</sup>雖仍屬於軍事史，但無論結構還是內容，都開始關注中國現代化。此外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戴安娜·拉里（Diana Lary）教授嘗試將這一傳統話題帶入社會史討論。<sup>8</sup>近十年，兩岸也有學者參與這種嘗試。<sup>9</sup>但目前的不足

<sup>3</sup> Herbert Feis, *The China Tangle: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53); Charles F.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, *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: China-Burma-India Theater, 3 Volumes* (Washington D. C.: Department of the Army, 1953, 1956, 1959).

<sup>4</sup> Tang Tsou, *America's Failure in China, 1941-50* (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3), pp. 48-50.

<sup>5</sup> John K. Fairbank, "Dilemmas of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: A Review Article," *Pacific Affairs*, 36:4 (Winter 1963-1964), pp. 430-437.

<sup>6</sup> Lloyd E. Eastman, *The Abortive Revolution: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, 1927-1937* (Cambridge, MA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); Lloyd E. Eastman, *Seeds of Destruction: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, 1937-1949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).

<sup>7</sup> Edward L. Dreyer, *China at War, 1901-1949* (London: Longman, 1995).

<sup>8</sup>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, eds., *Scars of War: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* (Vancouver: UBC Press, 2001); Diana Lary, *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: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, 1937-1945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0); Diana Lary, *China's Civil War: A Social History, 1945-1949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5).

<sup>9</sup> 呂芳上主編，《戰爭的歷史與記憶（3）：戰爭中的人與社會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15）；李學

仍在於，政治史未走出鄒讜、抗戰史尚未走出「抗戰」。

本書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成功實現了軍事史與中國史的直接對話，這是以往學者努力嘗試但遠未達成的使命之一。方德萬氏早年師從哈佛的孔飛力(Philip A. Kuhn)教授，受中國現代史的訓練，對中共黨史、國民黨史、近代海關史都非常熟悉，對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民族主義的話題多有建樹。全書以中國現代化為主軸，以政治人物蔣介石為主線，以民眾代表齊邦媛、陳克文為輔線，以靈魂人物克勞塞維茲(Carl von Clausewitz)為暗線，分為四個部分——「立國大業」(1927-1937)、「歷史轉捩點」(1937-1942)、「試煉」(1942-1945)、「新中國」(1945-1953)，貫穿論述了長年大規模戰爭，即抗戰、內戰、韓戰對中國的影響。

和多數英文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一樣，中國的現代化是本書的關注核心。在第一部分「立國大業」裡，作者藉蔣介石的個人發跡，講述了民國由無到有以至大戰前的種種形塑過程，既是鋪墊，又是提綱。軍事現代化，或者說西歐近代民族國家以及軍隊建設理念對中國的作用，是這部分的論述重點。作者並沒有花過多的筆墨去介紹蘇聯贊助的國民黨北伐，而是著重強調了德國近代軍事思想對蔣介石的影響，上至戰爭哲學、制度建設，下至士兵素養、武器裝備等。作者尤其提到了馮·伯恩哈迪(Friedrich von Bernhardi)，認為戰爭是具有創造力和淨化的手段，並將之與蔣的軍事思想發生聯繫(頁76)。由此，蔣介石在1937年決策時表示：「如果這回戰爭能勝利，國家民族就可以復興起來，可以轉危為安，否則必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中」(頁129)。在作者看來，正是蔣的這一決策，將民國帶入了轉捩點。

第二部分「歷史轉捩點」開始集中描寫戰爭。武器的革新是軍事現代化的標誌，例如海軍的配置、迫擊炮的射程(頁136)、空投炸彈(頁144)與戰略遠程轟炸機的使用(頁203)。作者尤其注重描述戰場的面貌(頁141)、

---

通、金以林、呂迅，《中國抗日戰爭史(6)：戰時經濟與社會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9)等。

飛機轟炸的慘烈（頁 145、205-206）、傷害平民之大（頁 140、160、181-182、185）以及殺戮戰俘（頁 165-167）等。書中專門批評了「焦土政策」，矛頭也不單指向國民政府，還提及了俄國人在 1812 年衛國戰爭和英國人在 1899-1902 年的第二次波耳戰爭中使用了類似的舉措（頁 178-184）。同理，在討論佔領地對日協力時，作者也不單是寫汪精衛，提及印尼的蘇卡諾（Sukarno）、菲律賓的羅哈斯（Manuel Roxas）、印度的鮑斯（Subhas C. Bose）和緬甸的翁山（Aung San）等（頁 214）。因此，本書不獨寫戰火中國，也是寫戰火中的人類。

作者更強調了教育與軍事現代化。現代教育不但影響了毛澤東、鄧拓、費孝通等左派文人，也造就了一批像胡適、晏陽初這樣通過教育來改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。教育和軍事的現代化，可以視為近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必由之路。舉例而言，作者在介紹毛澤東時特別指出，「現代的學校和大學為他鋪設了一條離開韶山的路」（頁 221）。但他沒有像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一樣強調雅禮（Yale in China）對青年毛澤東的幫助。<sup>10</sup>而是強調克勞塞維茲的《戰爭論》對其名篇《論持久戰》的影響：「《論持久戰》從它辯證式的推論、對指揮官理性計算和群眾意志重要性的強調中，都可以看到《戰爭論》的輪廓」（頁 227）。更進一步，「毛澤東不只從克勞塞維茲處學到軍事理論，還將之擴充」，「毛澤東發現克勞塞維茲在談到人民對戰爭的支持時，有許多地方都符合自己的想法」（頁 228）。

全書的另一貢獻是重新評價了抗日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以及史迪威（Joseph W. Stilwell）使華的作用。方德萬氏是西方最早質疑史迪威將軍的知名史學家。<sup>11</sup>在第三部分「試煉」中，「史迪威的表現極糟」（頁 268）：第

<sup>10</sup> Jonathan D. Spence, *Mao Zedong* (New York and London: Viking, 1999), pp. 38, 44.

<sup>11</sup> Hans van de Ven, "Stilwell Revisited," in *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-1945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3), pp. 19-63. 審視蔣史矛盾的中文著述請參見梁敬錚，《史迪威事件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2）；齊錫生，《劍拔弩張的盟友：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，1941-1945（修訂版）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2）；呂迅，《論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中的中共因素》，《社會科學研究》，2016 年第 2 期，頁 148-158。

一次緬甸戰役，史迪威作為戰場指揮官拋棄中國援緬士兵而臨陣脫逃（頁 261）；「史迪威的看法不僅和他的直屬長官相左」，也和陳納德（Claire L. Chennault）相異（頁 264），以「私怨傷害了美國在中國和緬甸的作戰行動」，他極度蔑視蔣介石，對之有「不加掩飾的無禮態度」（頁 268）；「性格確實難搞」（頁 298）。書中更藉魏德邁（Albert C. Wedemeyer）將軍之口，總結道：史迪威「不論在性格還是能力上，都不足以做個好軍團指揮官」（頁 307）。作者對美國政府的立場和行為也不無批評，暗示馬歇爾（George C. Marshall）相當輕視中國，僅將之充當美國空軍的基地，或者作為一個象徵，「可以維持中國的參戰」而不至於為敵所用（頁 264）。作者還提到了 1942 年杜立德空襲「對中國造成嚴重的附帶損害」（頁 256-257）、開羅會議之後食言的是羅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）而非蔣介石（頁 271-272），以及盟軍轟炸武漢的危害（頁 297）等。

最後一部分「新中國」，主要寫抗戰的勝利並未給中國帶來和平。作者利用了大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華檔案，來透視中國戰後的社會狀況。他把東北稱為「東亞的巴爾幹」（頁 349），尤其深刻。美蘇對東北的政策演變正是戰後國共再戰的導火線。林彪在東北接受蘇聯援助的情況（頁 369）下，「根據蘇聯戰場經驗」（頁 371）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。而與東北接壤的朝鮮，那裡發生的另一場內戰，最終確立了中國大陸與臺灣至今的政治面貌（頁 384）。

綜觀全書，如何在軍事史著作中感受到「人」原本是歷史寫作的一個難題，而此書卻蘊含著一股悲天憫人的人文色彩。作者以《申命記》第五章第 9 節世代相傳的責任作為開場白（頁 35）。正如序言所述，這是一本「為自己而寫」的「非常私人的書」（頁 16），反映了作者的寄託：「有關戰爭本質、對民眾的影響和遺緒」（頁 17）。書裡強調戰爭的受害者不是數字，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「人」（頁 168）。具體的方法，是在敘述史（narrative history）的基礎上，鑲嵌普通人的經歷描述（personal account），使之體現人性。作者巧

妙地將齊邦媛和陳克文的人生點滴匯入到戰時中國的洪流之中。陳克文是南方人，他供職中樞，官不太大也不過小，與毛澤東、蔣介石都有交往，處在能對政局有全面觀察的地位；日記從 1937 至 1952 年，與討論的重點時段高度吻合。而齊邦媛從北方來，晚陳先生一輩，在漫長戰爭歲月的的主要身分是流亡學生，以少女視角為全書平添了一份活力和悲憫的情愫。同樣出於對「人」的尊重，全書大量參考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，其規模和廣度是英文學界前所未見的。總之，這是一部不錯的人文學科專著。

如果說這部大書尚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，似可歸納為以下數點。首先，克勞塞維茲是十九世紀早期的普魯士將軍，《戰爭論》成書於其逝後翌年（1832）。其書以現代戰爭具有充足的正當性為前提，視戰爭為一種理性的科學系統，視著名戰例為「真正的藝術品、戰略家的傑作」（ein rechtes Kunstwerk strategischer Meisterschaft），忽略其野蠻和危害的本質屬性。<sup>12</sup>本書作者以其為切入點或側重點，縱然可以分析戰場各方的戰略計畫成敗，評價作戰能力優劣，但其所暗示的上帝視角，不可避免地繼承了傳統軍事史過於抽象（或者過於科學化）的弊病，這就沖淡了人的主題。質言之，與作品本身所表現出來的人文關懷相悖。因此，作者一方面繼承了以往學者對軍事現代化的推崇，一方面又表達出了對現代戰爭巨大殺傷力的反感。另外，作者藉《戰爭論》對《論持久戰》的影響，說明克勞塞維茲對毛澤東現代軍事理論的影響，多少也有些牽強。毛澤東似乎連《戰爭論》都未讀完，而且他寫《論持久戰》也並非在擴充現代軍事理論，主要是為了解決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。<sup>13</sup>實際上，與其說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克勞塞維茲的擁躉，不如說他們，乃至一戰前後的一批中國政治文化精英，都深受德國國家主義的影響。

二戰時，德國又變成了敵人，美國成為盟友。但如果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「得益於美國甚豐」（頁 252），似乎也不盡然。把廢除不平等條約、租界，

<sup>12</sup> Carl von Clausewitz, *Vom Kriege* (Berlin: Ferd. Dümmlers Verlag, 1905), p. 131.

<sup>13</sup> 楊奎松，〈毛澤東為什麼要寫《論持久戰》？〉，《抗日戰爭研究》，2018 年第 3 期，頁 31-33。

視為美國政府或者羅斯福總統的恩賜，並不妥當。羅斯福具有反殖民主義傾向，這沒有問題。但說到美國對華政策，且不說這種戰時安撫政策出於何種政治動機（參見頁 256），單就「治外法權」亦未徹底廢止，及至戰後兩年，美軍在華肇事不了了之而免予懲處者多矣。<sup>14</sup>而成爲「四強」的說法，現在看來就更具諷刺意味。書中談論的種種事實，也不似說明羅斯福將國民政府視作四強之一。比如，作者也承認，「不止參謀首長聯席會和軍火分配委員會排除國民政府參加，連美、英、荷、澳司令部協調如何對日進行防衛作戰時也排除國民政府」（頁 255）。再比如，《波茨坦宣言》「沒有詢問蔣介石的意見」，只在公布前幾個小時，讓其過目，蔣能做的只是「要求將中國列名」（頁 286）。作者亦不會否認，國民政府始終被排擠於同盟國戰略決策之外，更是美蘇戰後勢力範圍的分割對象之一。因此，這種所謂政治上的「得益」和軍援一樣，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另一力證罷了。可以說，同盟國內部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對華歧視。我相信作者也會同意這個看法，因爲他在隨後的章節寫道：「馬歇爾或許無法迴避邱吉爾的頑強的建議，而史迪威則不會讓這麼個老中壞了他的事。」（頁 260）此處「老中」原文有意使用種族主義的蔑稱“Chinaman”——即中國佬——來加以暗示。

本書起始表示要將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面向的關注，轉向農村地區」（頁 45）的願望似乎也未實現。作者雖然盡力說明農村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（頁 220、363-365），但從久居城市的知識分子（無論國籍）口中得來的鄉村，或許仍帶著難以抹殺的距離感。作者表示「很難得知」農村和農民對戰爭的直接反應，而且落後的消息傳遞方式讓農民（甚至識字的鄉村教師）對正在發生的戰事「一無所知」（頁 156），這當然極爲可能。但如果說「戰鬥已經打到近得可以聽到兵戎相接聲的距離，他們仍然在農地裡耕作」（頁 156），完全是因爲他們無知，也不盡然。中國農民在很長的時段裡都是被牢牢地綁縛在土地之上的，對於農民來說，即便知道戰事迫近，想要背井離鄉而

---

<sup>14</sup> 呂迅，〈論國民政府司法中的美國人刑案〉，《社會科學研究》，2020年第6期，頁191-196。

成爲戰爭難民，也並非人人可以辦到。就歷史研究來說，農民的失語狀態，也是長期的缺憾。所幸十五年來，中國的社會史工作者編輯出版了大量二戰口述史資料，其中就記載了農民記憶和言說出來的戰爭面貌，可供參考。<sup>15</sup>讓戰爭背景下的失語者重新發聲，應成爲傳統軍事史研究重新煥發生命力的源泉所在。

最後，全書譯筆有待改進，不符合中文表達、冗字漏字甚至錯訛之處甚多，僅舉突出數例：一個是作者在介紹「七七事變」時，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，即蔣介石誤判了當時形勢，「判斷」（judgement）日本不想「打大仗」（serious war），以強化的立場（enhanced status）來回應事變。雖然語帶微責，但基本符合已知的歷史事實，原本屬於可以商榷的範圍。但譯者誤用了帶有明顯感情色彩的詞彙，過度闡釋作者的立場，使之演變成頗爲嚴厲的指責：蔣介石突然「拉高姿態」，「揚言」日本不想「衝突」，「儼然決定」阻撓日本蠶食華北，才使得「即便不想在這個時刻引發和國民黨的戰爭的一些日本領導人，包括軍方在內，因而也不能讓步了」（頁 110）。不論作者再怎麼強調日本侵略在先，這也有一種本末倒置之嫌。再一個是抗戰結束時，南京受降的盟軍代表中，赫然混入了「德國」軍官（頁 316）。查原文才知是「荷蘭」（Dutch）的誤譯。還有地名如「拉姆格爾」（Ramgarh, 頁 264），通常譯作「蘭（姆）伽」。另外，頁 66 云孫中山係由「胃癌」辭世，而 2016 年發現其死因應爲膽囊癌。<sup>16</sup>綜上所述，全書如能進一步修繕，善莫大焉。

<sup>15</sup> 例如張成德、孫麗萍主編，《山西抗戰口述史（三卷）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；尹世洪、傅修延主編，《永遠的慘痛——江西省搶救抗戰時期遭受日軍侵害史料·口述實錄（兩卷）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0）；楊聖清主編，《苦痛的記憶——中條山戰役難民口述歷史實錄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1）；郭曉紅主編，《上杭抗戰時期潮汕難民口述史調查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15）；王習明、陳濤等，《楚鄉巨變：七位村幹部的口述歷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5）。

<sup>16</sup> Rolf F. Barth and Jie Chen, "What Did Sun Yat-sen Really Die of? A Re-Assessment of His Illness and the Cause of His Death," *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*, 35:9 (September 2016), p. 488.